



董果良译

*Souvenirs*

# 托克维尔回忆录



商务印书馆

# 托克维尔回忆录

〔法〕托克维尔 著

董果良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4年·北京

## 译者前言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是法国推翻七月王朝、建立第二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欧洲各国的革命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现代的历史学家研究这段历史时,经常引用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勃朗的《一八四八年革命史》和达尼埃尔·斯特恩的《一八四八年革命史》(共3卷)等书。对于二月革命的回忆和见闻,主要有维克多·雨果的《见闻偶记》、当时奥地利驻法大使馆馆员鲁道夫·阿波尼的日记,以及当时任巴黎督察总监的山岳派科西迪埃尔的《回忆》。现在译出的《托克维尔回忆录》,在这类回忆录中占有尤其重要的地位。关于此书的介绍,请读者阅读本书的《编者导言》,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作为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有他自成一家的看法,但作为政治家,他又不免受到出身和阶级地位的限制。读者只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本书对于当时许多人物(比如路易·菲力浦、路易·拿破仑、阿道夫·梯也尔、路易·勃朗、奥迪隆·巴罗、阿尔方斯·拉马丁、阿尔芒·马拉斯特、弗朗索瓦·维维安,等等)的评述十分尖锐,用语刻薄。我认为可能由于这个原因,本书在他死后34年(1893年)才首次刊印出版。这时,上述的人物都已去世了。

《回忆录》涉及的时间,如作者自己所说,仅限于二月革命,而

且只到他辞去外长职务为止,为时只有1年零8个月,但实际上也谈到路易·拿破仑政变(1851年12月2日)。作为回忆录来说,时间似乎短了一些,但我认为它对于研究这位世界文化名人的思想和活动仍是十分重要的资料。

译文依据的原本是梅耶编《托克维尔全集》的第12卷(1964年版)。本卷的编者吕克·莫尼埃对《回忆录》的出版经过和特点作了详细的介绍,省去译者在序言里再啰唆了。

限于译者的水平,错译和误解之处在所难免,惟望读者指正。

董果良 于北京寓所

2003年3月

# 目 录

编者导言	1
------	---

## 第 一 部 分

第一章 [《回忆录》的由来和性质——1848 年革命之前时期的概况——这次革命的前兆]	27
第二章 [宴会运动——政府的安全——反对派首领关心的事情——他们对大臣们的指控]	43
第三章 [2 月 22 日动乱——23 日的会议——新内阁——迪福尔先生和博蒙先生的感想]	54
第四章 [2 月 24 日——内阁的反抗计划——国民自卫军——贝多将军]	63
第五章 [议会开会——奥尔良公爵夫人——临时政府]	74

## 第 二 部 分

第一章 我对 2 月 24 日的原因的判断及对由此产生的事态的看法	93
第二章 2 月 24 日次日的巴黎以及以后几天的情况——新革命的社会主义特点	101
第三章 旧国会议员在作决定时态度暧昧——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反思和我的决心	111
第四章 我在芒什省竞选——地方的情况——大选	121

第五章	制宪议会第一次会议——这个议会的场面·····	133
第六章	我与拉马丁的关系——拉马丁的犹豫不定·····	146
第七章	1848年5月15日·····	154
第八章	协和的庆典和走向六月事件的道路·····	169
第九章	六月事件·····	179
第十章	六月事件(续)·····	200
第十一章	宪法委员会·····	213

### 第三部分

第一章	归国——内阁成立·····	235
第二章	内阁的面貌——至6月13日造反失败内阁的初期 行动·····	247
第三章	国内政治——内阁的内部纷争——内阁面对多数派 和总统困难重重·····	263
第四章	外交问题·····	279

### 附 录

一	古·德·博蒙谈2月24日·····	317
二	与巴罗的谈话(1850年10月10日) 巴罗谈2月24日·····	322
三	1848年2月24日纪要 迪福尔先生和他的朋友为阻止二月 革命所做的努力——梯也尔先生使这些努力不起作用应负的责任·····	325
四	为1848年6月至1849年6月的《回忆录》所写的笔记 (1851年4月)·····	329
五	关于我将要写的《回忆录》部分内容的提要(1851年4月， 在归国途中)·····	335

六 1851年5月15日我与共和国总统的谈话(我从意大利回国后与他首次见面) .....	343
七 修改宪法——1851年6月21日应我之邀来我家会晤中贝里耶与我的谈话。我们二人都是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 .....	346
人名索引 .....	349

## 编者导言

7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的《回忆录》具有双重意义：它是一位既是一出重大历史剧的观众又是其演员的人关于这出历史剧的证言。还没有人像他这样非常动人地描写过法国的1848年革命，也没有人像他这样对这一事件作过十分精湛的评述。因此，《回忆录》使它的作者一举名列19世纪的伟大回忆录作者之中。但是，《回忆录》还有另一个理由引起我们重视：这部著作也是托克维尔人格的最明显的表现。《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一向严肃的作者，在这里却表现得非常不同，即《回忆录》反映了他一生中尚不太为人所知的一面：政治生涯。

托克维尔当了将近12年的政治家，并把他的最充沛精力都用于公务。公务甚至使他没有时间从事写作。他的公务活动始于1839年。这年，他在故乡诺曼底省参加众议员竞选，在该省的瓦洛涅区当选。当时他只有34岁。但他只担任了一届议员。4年前，即1835年，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上卷问世。七月革命不久，他同友人古斯塔夫·德·博蒙去了美国，在那里对这个国家的制度和民情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1830年的七月革命，加强了他认为社会必须走向民主的信念。因此，他决定去这个似乎已将民主提出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解决了的伟大国家去亲眼看一看。托克维尔考察平等给新大陆带来的成果时并没有忘记欧洲，因为汇报其



旅行观感的那部书的惟一目的，是叫他的同时代人对这场伟大的民主革命做好思想准备。这部名为《论美国的民主》的著作，取得了公认的辉煌成就，曾多次再版。《论美国的民主》为他在1838年进入人文和政治科学院打开了大门，也使他在1841年成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于是，他的个人声誉得到同胞的赞同。另一方面，他的名字也可能被一些人诋毁。托克维尔出身于贵族家庭，这个家族的历史在几个世纪中同诺曼底的历史有密切的联系：他的一位祖先曾跟随征服者纪尧姆跨过英吉利海峡征服英格兰，所以这个家庭在诺曼底地方影响很大，因而可以认为是贵族家庭。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托尔维克的父亲差一点上了断头台，是热月9日政变救了他。热月9日复辟期间，他的父亲当过一任省长和一届贵族院议员。因此，在查理十世时当上凡尔赛最高行政法院初审法官的托克维尔，就被认为是贵族，并有正统主义派观点。但是，说他在七月王朝下依靠选民的拥护而获得各种头衔并不完全正确。托克维尔在1837年首次参选失败。2年多之后，他反败为胜。从此以后，瓦洛涅区一直支持他。他一再连续当选，而且票数一直增加，总是领先，直到12月2日政变退出公共生活。

夏尔·德·雷米萨写道：“此人个子不高，也不魁梧，为人和蔼，规规矩矩，但面带病容，只有他那稠密弯曲的棕色头发，能给人以年轻的感觉；他沉默的忧郁表情，在谈话时显得最为清楚。他的面色苍白，使人立即觉得他身体有病，猜测他容易发火和被人嫉妒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切。但他绝非如此。他只是容易被人怀疑，为此经常感到痛苦，但总是能自己消解。因此，他不太爱与人交谈，绝不无缘无故地反对一切自由主义。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绝不是搞阴谋诡计或表示革命愤懑的思想。他没有主动去讨好梯也尔和

基佐,而这二人认为这是出于他的嫉妒心理。他们也没有去争取他。他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在众议院的表现卓越而且态度冷静,只是对议长鲁瓦耶—科拉尔阻止他伸张正义大发其火。他几乎不在心中记仇,所以也不生根。他想的很多,说的不多,从不打听我们都写了什么和做了什么。因此,他与同行之间的关系长期冷淡, 9 在评价他时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这种冷淡自然也使他与我之间几乎完全断绝往来。我们最后只是彼此心照不宣,谁也没有为此大吵大闹……他的为人处事简单和缺乏热情,使人觉得他好像生活在他所在的世界不同的另一个世界里。但是,他的完全不需求助和缺乏情感,只会损害他的发言效果;他在讲坛上发言的时候总是冷静的;他从不大言不惭,从不恶语伤人。”<sup>①</sup>

亨利希·海涅谈到托克维尔时不无奚落地说:“此人头脑不易冲动,所以他的言词像是一块有棱有角的冰,发射着某种冷光。但是,他的友人博蒙先生却没有给人以这种感觉,此人感情丰富。尽管如此,我们却经常看到这两位密不可分的友人在旅行、出版著作和众议院中始终合作,给人以相得益彰的印象。一个是严肃的思想家,一个是热情奔放人士,好像是醋瓶与油瓶并排摆放在一起。”<sup>②</sup>

政治给托克维尔带来的失意,大于他从中得到的满意。他在众议院没有取得他想要获得的地位,没有能够发挥他想要发挥的作用,没有取得他拟议的成功。但他却积极工作。他参与辩论和在会上发言,有些发言后来成为名文。他是一些重要法案的报告

---

<sup>①</sup> 夏尔·德·雷米萨:《我一生的回忆》,由夏尔·H.普塔斯推荐和注释,第4卷,巴黎,普隆出版社,1962年,第45页。

<sup>②</sup> 亨利希·海涅:《德国人与法国人》,巴黎,1868年,第313页。

人,但他未能立即适应议会工作,或总是感到这项工作不是从心所欲。他很快就指出这一点,揭发有人在这项工作中搞阴谋诡计。对于有人把政治看成出风头的一般手段,公务人员是出于个人利益和依靠自吹而轻易实现其原则,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样的行为有悖他的道德,当然也有悖他的绅士自尊。终于有一天他写道:“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卑鄙行径,不是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由于时运不济,害怕失去职位而遭到惨败时所为,就是他们把野心和激情集中于追求权力,不愿意失去权力时所为。他们有一种害怕心理,使他们对权力产生错误的理解,以至为了现在而牺牲未来,为  
10 了职位而不顾荣誉。”<sup>①</sup>托克维尔绝不以委曲求全(即使是轻微的)来获得成功。有人强迫他采取这种态度。这便给他带来痛苦,因为这使他辞谢了一切暧昧的好意,远离一切轻而易举得的亲近。托克维尔非常清楚,停于不应停止之处问心有愧。他认为附庸他人是可耻的。他不会奉承恭维。他写道:“不管我遇到什么人,只要他的精神或感情中没有什么罕见的东西打动我,都可以说我没有见过这个人。我向来认为,不管是平凡的人还是才能出众之士,都有一个鼻子、一张嘴、两只眼睛,但我又记不住他们每个人的容貌特征。我不断询问这些每天见面但又叫不出名字的人士的姓名,而后又不断把他们的姓名忘掉;我绝不是轻视他们,而是不常同他们见面,见面时也只是说些客套话。他们在领导大众,所以我尊敬他们,但他们又使我感到非常厌烦。”<sup>②</sup>另一方面,这位信心坚定的人又令人十分感动地、不知疲倦地献身于议会工作。他认为政治

---

<sup>①</sup> 《1841年11月30日致斯托费尔的信》,载《未曾发表的作品与通信集》,第1卷,第446页。

<sup>②</sup> 《回忆录》,见本书第二部分第3章,第103页。

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他便竭尽全力去从事这一工作。在辩论中，他积极讨论政治问题。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讨论我不感兴趣的问题时我讨厌；讨论我认为重要的问题时我痛心。我认为真理非常金贵和十分罕见，但我一旦发现它，并不爱随便拿来讨论。”<sup>①</sup>因此，他登上讲台时总是忐忑不安。他确实没有口才，他的朋友古斯塔夫·德·博蒙向我们透露说：当他受到一种活跃而深刻的感情控制时，这种感情就会推动他、影响他和控制他。托克维尔不是一位卓越的演说家。他的声音很弱，没有抑扬顿挫。尤其是他不能放弃他的文人习惯。有一天纳索·西尼尔问他：“你知道你说话时你那作家的态度造成的后果吗？”托克维尔回答说：“是可怕的。我进入众议院后，就试图去掉作家的形象，但没有成功；我知道在这方面做得完美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基佐。”<sup>②</sup>其中有一篇谈话还提到因托克维尔的体力不支而经常中断谈话。托克维尔继续以其需要关心照料的虚弱身体忙碌于官场。在通信中他曾多次表示自己不得不放弃政治生活，感到自己没有继续从事这项工作所需的体力。

11

在进入众议院后，托克维尔本想深入到极其广泛的政治生活的中心。他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同国家并无实际联系的死气沉沉的封闭的世界，每天都感觉不到有留在这里的必要。

议会上的辩论并不高尚。在辩论中，一些原则性问题经常带有庸俗的私见，而热火朝天的争论都是事先安排的，所以他很快对这种辩论失去兴趣。而在不是因学说的对立而是因个人的好恶而

---

① 《回忆录》，见本书第二部分第3章，第103页。

② 《1834年至1859年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与纳索·威廉·西尼尔的通信和谈话》，辛普森出版社，共两卷，伦敦，1872年。第1卷，第68页。

分成的党派之间他是怎样行事的呢？托克维尔心中决定，对于自己必须做的并认为不会有错误的事情决不动摇不定。他在一次回忆中提到他在路易·菲利浦统治的最后十几年中的政治生活的苦恼。对七月王朝的最严厉指责，使他确实失去关于这个王朝伟大的思想，希望法国人也放弃这种想法和不再怀有无谓的激情，在继续追求物质财富时爱护他们的自尊心，以便更好地提高自己的道德涵养和健全自己的斗志。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托克维尔信守的是什么政治原则呢？他属于哪个党派呢？1837年3月22日他写信给英国友人里夫说：“人们都殷切地希望我成为一个有党派的人，而我决不这样。人们叫我振奋激情，而我则只认为，与其振奋激情，不如爱自由和珍惜人的自尊。在我看来，各式各样的统治形式，只能是比较完善地满足人的这种神圣而合法的激情。”<sup>①</sup>

这段思想表白，可以视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的道德和道德抱负的总结。托克维尔为了自由而热爱人的本性。关于他因为没有自由而未能使国家真正伟大、使人真正自尊的想法，并没有被任何人接受。他只要谈到自由就一定提到人的自尊，认为前者  
12 必须求助于后者。自由，人的自尊，是评价人有理由存在的最高标准。他在年轻时期目睹的事件，只能加强他对自由的这种根深蒂固的看法。1825年，托克维尔已经20岁。他11岁时，看到了拿破仑帝国已经崩溃。波旁王朝的复辟，使法国重新得到安全与和平。复辟使法国有了一个代议制的政府，承认了反对派的权利。法国首次学习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不难看出，当时的法国青年也

---

<sup>①</sup> 梅耶编：《托克维尔全集》第4卷，《英国通信》第一部分，第37页。

像托克维尔一样热烈地欢迎新的制度，满怀激情地跟着这个试验的发展前进。这几年给他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以至很久以后在1848年革命后他还在怀念这几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年轻时期，在一个恢复了自由的重新走向繁荣和伟大的社会环境里度过极为美好的岁月；我在这个社会里产生了关于中庸适度的、受到信仰、道德和法律支配的自由的自由的思想。我被这种自由的魅力所征服，它后来成为贯穿我一生的激情。”<sup>①</sup>

在这样的条件下，正如人们所知，凡是走向民主的事件，一直受到托克维尔的关心。这种以不同速度在世界上加速前进的革命，是托克维尔最严重关注的对象。他考察了民主在美国的作用，从中精心联系了民主在欧洲的进展。他知道，民主既能发生良好的作用，又能发生不良的作用；民主既能提供安全，又能带来危险。他向他的同时代人指出了这种危险的苗头：社会在向下拉平了身分的平等；身分的平等正使传统的精英部分逐渐消失并破坏社会的良好风尚；个人在权力更加集中和更加强大的政权面前更加孤立、更加软弱无力和更加麻木不仁；公民养成凡事依靠国家的习惯，不知不觉地丧失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在民主制度下生活的人民必然消失的政治激情，只能被另一种激情所取代，而这另一种激情又随着另一种激情，即对安定生活和物质福利的热爱的逐渐消沉而加强起来；这些人民为了得到这种福利每天都急于把自己的一些权利让给国家，而国家也鼓励这种使独立的人更加软弱无力的趋势。一个失去了自尊心的社会还能有爱好自由的兴趣吗？<sup>13</sup>因此，托克维尔对于未来的几代人中间能否出现不使进步停止的

---

<sup>①</sup> 《回忆录》，见本书第二部分，第1章，第86页。

民主深表忧虑。民主不是在破坏使人应当尊严地生活的一切，叫人忘记其本质的东西而歌颂人的奴性吗？但是，怎样才能立即摆脱这种厄运呢？怎样才能防止社会在走向民主的时候无意之中扼杀人的自尊心和光荣感呢？托克维尔认为只有一种救治办法：那就是提倡公民精神。

他认为公民精神是人对自由的天生热爱。这是一种家庭的遗产，一种不仅由男人而且也由女人传下来的传统。实际上，这是托克维尔在赞扬他的祖母——他经常提到她。他在嘱咐他的过继儿子要在个人生活中尽到自己的一切义务后，总是不忘附带说：“还有，我的孩子！千万不要忘记一个人应对祖国应尽的义务；不对祖国尽义务，就不能为国献身；不能对祖国的命运漠不关心；上帝要求人随时准备贡献一切，用自己的时间、财产甚至生命去为国家和国王服务。”<sup>①</sup>

对托克维尔说来，从政是一种义务，一种道义责任。他没有忘记自己是属于曾经统治过法国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在这个贵族阶级中，依然存在着旧的领导阶级的责任感。他就是以这种心情投入七月王朝下的公务的，在投入时不仅怀有个人的工作热情和抱负，而且怀有尽义务的精神。

1848年2月24日，当七月王朝垮台的时候，托克维尔并未为此而惋惜。这不是因为他已经预想到这场革命的结果，也不是因为他已经认识到自由更有惊人的活力，而是因为他看到法国从长期的沉睡中猛醒过来。法国好像又看到自己的前途。不错，法国

---

<sup>①</sup> 《1856年9月10日致斯威琴夫人的信》，载《未曾发表的作品与通信集》第2卷，第340页。

是在踉踉跄跄中走向未知的未来。许许多多丑恶的势力在使法国消沉,但也有一股伟大的精神在激励法国。尽管局势有些混乱,但并未妨碍托克维尔尝到获得解放的感觉。他看到了这个一直使他感到局促的貌似彬彬有礼的世界无疾而终。他呼吸到更加清新的空气。特别是在困难重重之中,清晰地看到前进的道路。当然,这条道路上布满荆棘,艰难险阻。但却步不前已不可能。曾多年困扰他的迟疑一去不复返了。斗争在召唤他。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认为值得勇敢地面向斗争。如果生活失去其存在的理由而变为赌博,则没有任何价值,因为自由和人的自尊受到了威胁。托克维尔要满腔热情地去保卫自由和人的自尊。“这里在拯救祖国,而那里在毁灭它。”他以从未有过的热情投入了激烈的斗争,危险没有把他吓倒,反而激起他的斗志。很快,失望接二连三出现。但是,他的政治责任感从来没有停止增强。

14

共和国在领导阶级的忙乱之中宣布成立,但3天之后领导阶级又突然失去权力。托克维尔毫不迟疑地归服于新政府。这不是因为他相信共和国政府很好地适应了法兰西的需要。但他认为,这是当时惟一可能存在的政府。他只想要一个保守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共和国。但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特点,却直接摆在他的面前。他对此并没有特别惊异。工人阶级长期以来进行的地下活动,已使他看到这方面的许多征兆。他曾多次向议员们发出警告信号:“你们没有看到他们的激情正从政治激情变为社会激情了吗?你们没有看到他们当中逐渐散布的观点和思想不仅要推翻现有的法律、内阁和政府本身,而且要推翻社会,动摇社会今天赖以存在的基础吗?”这些话是在七月王朝垮台前一个月,于其有名的1848年1月27日讲演中说的。



但是,托克维尔在阐述促使巴黎工人采取起义行动的原则时对情况的不甚了了,使我们发现这位先生的观察力并不敏锐。他认为,工人阶级起义的原因不是饥饿,而是贪婪而盲目的愿望和错误的思想:喜欢物质享乐,既羡慕民主,又鼓吹那种叫人民相信人类贫困是现行统治的结果而非天意的结果,认为贫困是可以通过改变基础社会而消除的。他在《回忆录》中谈到六月事件时说:“贪婪的欲望和错误理论的结合,使这次动乱在发生之后变得如此可怕。有人叫这些穷人相信,富人的财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偷窃的产物。他们还叫穷人相信,财产的不平等既违反自然,又有悖于道德与社会。在贫困和激情的促使下,许多人相信了这些宣传。”<sup>①</sup>

1848年4月10日,他在致纳索·西尼尔的信中又发挥了这一思想:“这不是出于贫困,而是出于导致这次大动乱的那些思想:即关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地位的空想思想,关于社会权力可以在劳资关系中发挥一切作用的夸张性理论,最终要使绝大多数人相信国家不仅能使他们摆脱贫困,而且能为他们提供富裕生活和福利的极端中央集权化学说。”<sup>②</sup>

《回忆录》中关于巴黎工人的论述,今日可能使我们有些反感,觉得他说得太简单了,不合人情和不公正。托克维尔把六月起义评价为“悲惨的”,但又是“必然的”。他甚至没有向我们隐瞒他不希望法国的革命运动按部就班地、和平地进展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为巴黎开始的一场大战把社会主义阻止了而高兴,并曾“祝愿战

---

① 《回忆录》,见本书第二部分,第9章,第151—152页。

② 《未曾发表的作品与通信集》,第2卷,第136页。